

鲁迅文集

导读本

「花边文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文集

第①⑥卷

花边文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花边文学

序 言	(3)
一九三四年	(8)
未来的光荣	(8)
女人未必多说谎	(11)
批评家的批评家	(14)
漫 骂	(17)
“京派”与“海派”	(20)
北人与南人	(23)
《如此广州》读后感	(26)
过 年	(28)
运 命	(30)
大小骗	(33)
“小童挡驾”	(36)
古人并不纯厚	(39)
法会和歌剧	(42)

洋服的没落	(45)
朋 友	(48)
清明时节	(51)
小品文的生机	(54)
刀“式”辩	(57)
化名新法	(59)
读几本书	(62)
一思而行	(65)
推己及人	(68)
偶 感	(71)
论秦理斋夫人事	(74)
“.....”“□□□□”论补	(77)
谁在没落?	(80)
倒 提	(83)
玩 具	(89)
零 食	(92)
“此生或彼生”	(95)
正是时候	(97)
论 重 译	(100)
再论重译	(103)
“彻底”的底子	(106)
知了世界	(109)
算 账	(112)
水 性	(115)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118)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124)

做文章	(127)
看书琐记	(130)
看书琐记 (二)	(133)
趋时和复古	(136)
安贫乐道法	(139)
奇 怪	(142)
奇怪 (二)	(145)
迎神和咬人	(148)
看书琐记 (三)	(151)
“大雪纷飞”	(154)
汉字和拉丁化	(157)
“莎士比亚”	(161)
商贾的批评	(164)
中秋二愿	(167)
考场三丑	(170)
又是“莎士比亚”	(173)
点句的难	(176)
奇怪 (三)	(179)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上)	(18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下)	(185)
骂杀与捧杀	(188)
读书忌	(191)

花边文学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序 言

1935年12月29日作。在收入《花边文学》前未在报刊发表。

《花边文学》收作者1934年1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外序言一篇共六十二篇。本篇是作者自订文集《花边文学》的序言。作者申明这些杂文在当时报刊发表的经过，还提及书名的由来，指出，“‘花边文学’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主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序言》还回顾了1934年以来国民党当局及御用文人对鲁迅杂文的查禁及自己文章被删削的情况，指出：“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

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黎烈文（1904～1972），湖南湘潭人。1932年12月开始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1934年5月被迫去职。文中提到“新任者不能细辨”，黎烈文离开《自由谈》后，由张梓生接任，张梓生（1892～1967）浙江绍兴人，也与鲁迅熟识，鲁迅继续投稿，这里鲁迅说“新任者不能细辨”，是为了迷惑国民党书报检查官，为张解脱责任。“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指“左联”成员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曾以林默笔名在1934年7月3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讽刺鲁迅，见本书《倒提》附录。文公直（1898～？）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

*

*

*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

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

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生长。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衍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一九三四年

未来的光荣

1934年1月8日作。最初发表于同月1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张承祿。

文章认为法国文学家德哥派拉声言不谈政治，本来可以跳出是非圈子，但逃不脱“外国文氓”的恶谥，因此这次到中国来，仍被这里的论客议论纷纷。文章揭露德哥派拉这次访华，是专来寻找“奇特的，色情的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他选择到中国来，是要把中国人民与所谓的“土人”一同登场。作者提醒说：“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这样的事为有趣。”鲁迅1933年12月28日致王志之信中也谈到同样意思的话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做书卖钱”。德哥派拉（1885～1973），法国小说家、记者。“外国文氓”，

1933年12月11日《申报》“北平特讯”说：
“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

*

*

*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扬古久列，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非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俗，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

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女人未必多说谎

1934年1月8日作。首次发表于同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赵令仪。

韩侍桁在1934年1月8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谈说谎》一文，污蔑妇女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鲁迅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从历史上看，女人从来就是为男人伏罪的牺牲品。韩侍桁（1908～1987）天津人，

当时在国民党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叔本华(1788~1860)，德国近代哲学家，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著有《妇女论》等。

* * *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的有几个。就是姒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